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 地方文化研究

· 第四辑 ·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辑部编

辑刊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主办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 地方文化 研究辑刊

DIFANG WENHUA YANJIU JIKAN

第四辑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辑部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第四辑/《地方文化研究辑刊》  
编辑部编. —成都:巴蜀书社,2011.3  
ISBN 978-7-80752-753-4

I. ①地… II. ①地…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2750号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四辑)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编  
编辑部

---

责任编辑	潘伟娜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a href="http://www.bsbook.com">http://www.bsbook.com</a>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翔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60mm×185mm
印 张	17.875
字 数	440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753-4
定 价	40.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目 录

## · 理论视野 ·

- “四川”得名的文化解读 ..... 谭继和 ( 3 )  
大文化视野下的鱼凫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刍议 ..... 王 方 ( 8 )  
行政法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 张邦辅 ( 13 )

## · 岷江流域文化研究 ·

- 三星堆残身鸟足人像考 ..... 冯广宏 ( 21 )  
蜀石经的形成、特色及地位 ..... 粟品孝 ( 28 )  
青城山、都江为昆仑圣山“成都山”、圣河“成都江”考 ..... 徐学书 ( 33 )  
大禹“岷山导江”与“开明决玉垒”传说的历史观照 ..... 纪国泰 ( 41 )  
大禹与李冰治水功绩述略 ..... 官性根 ( 52 )

## · 四川名人研究 ·

- 卓文君与中华才女之乡临邛 ..... 祁和晖 ( 61 )  
也谈诸葛亮的“政治野心”——从荆州之败说起 ..... 张清华 谢元鲁 ( 67 )  
论五代西蜀词人“拟作闺音”的时代元素 ..... 张 帆 ( 72 )  
苏洵与欧阳修的文章之交及其对当时文风的影响 ..... 杨胜宽 ( 78 )  
论“三苏”产生的政治文化生态 ..... 潘殊闲 ( 88 )  
李调元三种《雨村诗话》述评 ..... 郑家治 ( 100 )  
郭沫若历史悲剧的存在主义解读 ..... 陈鉴昌 ( 108 )  
庞石帚先生与《国故论衡疏证》 ..... 张志烈 ( 115 )  
周太玄与中国现代新诗 ..... 王学东 ( 124 )  
国学大师刘咸炘先生研究述论 ..... 张 霞 ( 129 )

浅议何其芳“情感粗起来了”以后 ..... 谢应光 (139)

### ·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

花山崖壁画的艺术人类学价值和意义 ..... 张利群 张逸 (145)  
 原生态绵竹年画与新年画的价值差异及保护与开发 ..... 刘能强 李璘 (154)  
 彭州方言“×起”词义变化所反映的等级观念 ..... 杨绍林 (159)  
 文化生态视野下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以京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 苑焕乔 (165)  
 佛山“行通济”民俗探析 ..... 申小红 (171)  
 揭秘彝族的谱系文化 ..... 曲比兴义 (181)  
 羌年史话 ..... 杨光成 (189)

### · 地方文化广场 ·

成都文庙街史话 ..... 袁庭栋 (195)  
 蜀汉政权与罗江 ..... 沈伯俊 (204)  
 试论温州地域文化特征、成因及创新发展 ..... 胡晓慧 (209)  
 唐诗中的江南寺院抒写及其文化蕴涵 ..... 查清华 汪惠民 (221)  
 从杭州西湖诗文看晚明江南城市文人的消费方式与观念 ..... 卢川 (228)

### · 开发与应用 ·

自贡井盐文化的保护对策探讨 ..... 邹礼洪 钟莉 (235)  
 马边文化资源及其保护与开发 ..... 吴会蓉 (243)  
 四川马边旅游业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 ..... 李钊 (256)  
 重庆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 赵冬菊 (267)  
 蜀商的群体站立与文化传承 ..... 于代松 (274)  
 探索大城市近郊农业生态旅游开发的新模式  
 ——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 义旭东 陈国先 (278)



# 理论视野



## “四川”得名的文化解读

谭继和

**内容提要：**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四川”这一历史地名的渊源进行了文化解读，即“四川”作为文化地域称呼的来源、“四川”作为经济管理区域称呼的来源、“四川”作为四条江的简称的来源。笔者认为，“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的得名，与四条江无关，而是同唐代将剑南道简称为“蜀川”，宋代将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两川”有关。文章还对“巴蜀”的历史概念进行了文化解读。

**关键词：**四川；得名；文化解读

“四川”的得名，根据文献考察，最早出现在宋代。在四川地域，宋代先是设西川路和峡西路。后来又把二路合并起来，再分为四路，包括成都府路（初名“益州路”，后改名）、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谓之“川峡四路”，又总称为“四川路”，这是“四川”一名用于行政区划代称的开始。“四川”作为省名，则始于元代。元代的中央行政机构叫“中书省”，各地的地方行政机构就叫做“行中书省”，这个名称的含义是指执行中书省的行政命令，故又简称“行省”，或径称为省。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建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四川行省”，再简为“四川省”，省治成都。这是“四川”省名得名之始。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元代以来，四川行政区划几经调整。1939年曾将四川省分为四川和西康两省，1955年西康省撤销，除金沙江以西划归西藏外，全部并入四川。1997年行政区划调整，又将四川分为四川省和重庆市。行政区域虽几经变异，但“四川”一名一直保留下来，至今已有一千多年。

“四川”作为省名虽然始于元代，但“四川”一名却来源甚早，远可追溯到唐代。追溯其渊源，我们不妨从以下三方面作一文化解读：

### 一、“四川”作为文化地域称呼的来源

早在大周武则天时，陈子昂上疏表中已把这一地域称为“蜀川”。唐代四川地域内分别



在剑南西川道和剑南东川道置节度使，故当时人习惯把两道合称，简化为“两川”。另有“西川”、“东川”之名，则是剑南、两川分别的简称。到南宋时正式出现了“四川”这个名称。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早在绍兴五年（1135），“始试进士于南省，惟四川即试宣抚司，自七年后，又移制置司”<sup>①</sup>。绍兴二十四年（1154）正月，“诏太学及诸路并以中秋日引试，惟四川则悉用三月十五日”<sup>②</sup>。这是“四川”一名出现得较早的文献记载。当时“四川”一名指的是川峡四路。川峡四路合起来作为一个“乡试”区域，考试举人的时间与其他区域不一样。其他诸路是八月中秋日“引试”，只有“四川”提前到三月十五日，因为要照顾四川的举人，“行在地远”，“恐赴（朝廷）御试不及”，故把考试时间提前。后来又为了照顾四川进试的士子，有云：“蜀士多贫，而使之经三峡，冒重湖，狼狽万里，可乎？”<sup>③</sup>到京师参加考试，长途路远，劳顿奔波不便，为了“革此弊”，特别允许蜀中士子就在本地省试，由中央派一“监试考官”。这些措施对于四川文人是非常优厚的。获得这种优厚待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巴蜀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区域，“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sup>④</sup>。行政区域上虽然是川峡四路各自管辖，但在文化地理上都属于巴蜀文化区，这四路的举子、秀才、士人均同属于巴蜀文化区，故“四路”的“乡试”（即省试）专门合并在一起。这里特别鲜明地表现出地域文化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是很强的，连行政管理也不得不服从区域文化，照顾区域特色。由此可见，“四川”这个名称的出现，首先是因为文化（乡试）的需要，由一个文化区域的名称变来的。有趣的是，宋代朝廷的会试还要照顾四川人的情绪而改变考试地点和考试方法：“川峡四路”，“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sup>⑤</sup>。四川人喜欢学习，“声教攸暨”，但不喜欢做官，不愿为仕进而万里奔波去赶考，朝廷只好允许四川单独会考。所以，“四川”的得名与文化有极大的关系。

进一步追溯，“四川”的“四”来源于川峡四路的“四”，上已述明。那么，为什么简称“川”呢？其实，“川”是对四川的江河的一种特殊文化符号的称呼。汉代扬雄的《蜀都赋》说：“凝水流津，漉集成川。”<sup>⑥</sup>按宋人章樵《古文苑》的解释，众水“凝注为大泽”，“渗漉潜行”，“会合众流”而成为大川，故称为“川”，江水也就称为“川江”<sup>⑦</sup>。《蜀都赋》又说：“湍降疾流，分川并注，合乎江州。”<sup>⑧</sup>众水至此，分川并注而会合成为江州（指古巴都，即今重庆）。由这两个例证看，“川”是指众多小水会合成为大江这种特征。这种特征被赋予一个“川”字，这就具有了一种隽永的文化意味。清代双流大学者刘沅作《四川考》一文，曾认为“四川”一名与“川”有关。所以说，“四川”一名，实是巴蜀人两千年文化心理认同的一个产物。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类省试”，中华书局，2000年，第262页。

②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诸路同日解试”，中华书局，2000年，第265页。

③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三“类省试”，中华书局，2000年，第262页。

④ [元]脱脱等：《宋史》卷八九《地理志》第四十二地理五，中华书局，1999年，第1500页。

⑤ 同上。

⑥ [汉]扬雄：《扬雄集校注》，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页。

⑦ [宋]章樵：《古文苑注》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 [汉]扬雄：《扬雄集校注》，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二、“四川”作为经济管理区域称呼的来源

北宋末政和元年（1111）五月的诏书中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诏四川羨馀钱物归左藏库”<sup>①</sup>，这是“四川”作为经济管理的行政区划略称的起始处。宋代设“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就是中央派驻川峡四路的官员，简称为“四川”。“本路安抚、转运、四川提举茶马置司”，“以成都而得行四川民事，自张焘始”<sup>②</sup>。这是川峡四路民事（包括实抚、漕粮转运、茶马贸易等）统一管理的最早记载。统一管理的官名几经变异，后来统称为“四川总领”，也就是总领四川经济事务。由此可见，“四川”一名是因为经济管理的需要而出现的。《方輿胜览·成都府路》一卷中，特设“总论四川总领”、“总论蜀酒”、“总论蜀盐”、“总论四川茶马”、“总论四路监司”、“总论四路定差”、“总论蜀兵”、“总论四路解省试”等栏目，其中大部分皆是四川的经济管理问题。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古无“总领”官名。靖康末年宋高宗时始设“总领措置财用”，但这不是官名。直到建炎末年，才设“总领四川财赋”，“总领之官自此始”<sup>③</sup>。全国设“总领官”是从四川开始的。“四川总领官”的职责，主要是管理四川茶马贸易，每年达到百万缗；管理“四川酒课”达四百一十余万缗；管理盐法达四百余万缗，管理四路定差和辟差等等。从收入看，淮东、淮西、湖广三总领的支出，“仅当于四川一年之数”，是个肥缺。绍兴五年（1135），“四川收钱物总三千三百四十二万缗”<sup>④</sup>，可见收入之高。由这些记载看，“四川”这个名称是为了总管川峡四路经济事务的方便而约定俗成的简称。“四川”后来在元代作为行省省名，其渊源是从“四川”作为一个经济管理区域而来的。

## 三、“四川”作为四条江的简称的来源

历来有种说法，认为“四川”一名是指四条水名。这有一定道理。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江沱潜汉”的说法，说明还在远古时代今四川地域的祖先就已有了四条水的概念。《新唐书·地理志六》载剑南道“其名山：岷、峨、青城、鹤鸣。其大川：江、涪、雒、西汉”<sup>⑤</sup>。这里，举了四座山名、四条“大川”名，说明在唐代人的心目中，剑南道的特征就是“四大川”，指岷江、涪江、沱江、西汉水（嘉陵江）。“四川”的得名与人们意识中的四条江确有一定的关系，由此而引申出“四川”这个概念来。但在唐代，这个称呼还未固定，还未得到人们认同。所以，“四川”究竟是指哪四条江，一直没有结论。民国时人郑励俭编著的《四川新地志》说：“长江重要支流十一，而川境者昔日有五，即雅砻江、岷江、沱江、嘉陵江及黔江是了。雅砻江、黔江位于两端，居省内者皆其下流之一部。川省中之四川者，究何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二〇本纪第二十徽宗二。

② [宋]祝穆：《方輿胜览》卷五—成都府路，中华书局，2003年，第900页。

③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一，第225页。

④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七，第391页。

⑤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二志第三十二地理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709页。

所指？岷、沱、嘉陵而外，或谓雅砻，或谓黔江。昔日论者纷纷莫定。自宁雅两属划归西康后，问题自然解决。”<sup>①</sup>这里说的只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与西康两省的情形。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四川”一名，有的说是指岷、沱、涪、嘉陵，有的说是指岷、沱、嘉陵、金沙江。这些说法各有不同，除岷、沱、嘉陵三江为共识外，另一江或为黔、雅砻、涪、金沙，各执一词，显然是随着四川的行政区划的变动而生起了种种说法。这反而证明了“四川”不是因四条江而得名，而倒是因为先有“四川”之名而后再来寻找这四条江名的。“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的得名，应与四条江无关，而是同唐代将剑南道简称为“蜀川”，宋代将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两川”有关。这些简称约定俗成，广为流传，到元代即举以为行政省的名称。

“四川”一名经历了上述历史演变的过程，有多种来源，是四川人多元化文化心理的表现。所有这些文化、经济、地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复合兼容而形成“四川”这个概念。

其实，比“四川”这个概念更早更久远的是“巴蜀”这个名称。直到今天，四川还简称为“蜀”。这里附带也说一下巴与蜀名称的由来。

巴与蜀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生长点。为了探源巴蜀文脉，这里要先追寻一个巴与蜀名称的来源。

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这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融合。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虫，“食象蛇”，是一种蚕食大象的巨蛇。这种解释历来为多数人所接受，也符合巴字字形形象的事物以及有关巴的各种传说。除此而外，还有一些关于巴字含义的不同解释，但多无确据，没有取得公认。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不但拥有包括长江三峡在内的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大部分地区，又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是一个包含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祇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在其他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麋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賸人之巴（板楯蛮）。从这里可以知道，巴是一个包括广阔地域范围和众多古代民族的称谓。

如果以文明古国作为巴的地域和民族主体的话，那么，殷墟甲骨文中的“巴方”就是它的代表。巴方就是巴国，殷商时代称国为方。巴方最初活动在汉水上游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入川东。

巴人以渝水即嘉陵江作为中心活动区域。巴人曾在阆中首建国都。“阆水曲折三回如巴

<sup>①</sup> 郑汝励：《四川新地志》，正中书局，1946年，第34页。

字”，嘉陵江围绕阆中城转折了三个弯，故其形如巴字。这是称为“巴”的由来的又一种解释。今天阆中这一巴字形山水城镇格局，已成为阆中古城的品牌。在阆中建都的巴人曾帮助周武王伐纣。到汉高祖时，巴人又改称賨人，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创作了巴渝舞。

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根据《诗经·豳风·东山》所说“蜎蜎者蜀，烝在桑野”，解释为“葵中蚕”，《尔雅·释文》引作“桑中蚕”，《诗经·毛传》释为“桑虫”。按照《韩非子·说林下》的描述，蠋虽似蚕，但又与蚕有一些体态上的区别。蠋与蜀为一字的两种写法，这样看来，蠋其实就是野蚕，它是现代家蚕的前身。

作为地名和族称，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古蜀王祖蚕丛、柏灌、鱼凫，以及杜宇、开明五代，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

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它们大多是指当时蜀国设置在汉中盆地的军事边圉和农作区。在西周的周原甲骨文中，也有“蜀”的刻辞。殷周甲骨文的蜀，指的都是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历史的三星堆文明。从商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尽管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都邑王权更迭，然而作为国名，蜀的名称始终未变。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 大文化视野下的鱼凫文化资源 研究与开发刍议

王 方

**内容提要：**本文从大文化视野的角度对鱼凫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鱼凫文化与古蜀文化、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理性思辨，在此基础上，针对温江区鱼凫文化的开发利用进行了思考，认为应当挖掘鱼凫文化蕴含的当代精神价值、在城市建设中融入鱼凫文化元素、加强区域合作、打造鱼凫王文化旅游品牌。

**关键词：**大文化；鱼凫文化；温江文化旅游；研究；开发

在地方文化建设中，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着力打造特色文化品牌，借以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已成为地方政府的共识。鱼凫文化作为温江最具历史底蕴和品牌优势的文化资源之一，无疑将在温江未来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鱼凫文化，顾名思义，是指与鱼凫相关的文化，包括其遗址遗迹、传说和相关衍生的文学、民俗等文化。它是古蜀文化的一种，但是，作为一种口传文化，鱼凫与蚕丛、柏灌等古蜀史前传说一样，可供今天查证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而已有的考古发现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还存在分歧。因此，在鱼凫文化的开发利用问题上，如何结合温江当代文化建设实际，形成自己的特色，是需要深入思考并谨慎对待的。这里，仅从大文化视野的角度谈谈鱼凫文化开发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何谓大文化视野？简而言之就是指以比较宽泛的视野和比较长远的眼光对某一文化现象进行考察、分析和总结，而不局限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利益。

为什么要强调大文化视野？主要是因为在全国各地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有的地方为了独享某一文化资源，不惜从本地的局部利益出发，以排他性思维对某些文化资源进行命名和占有，如“××故里”、“××之乡”，以至一些地方为了争夺某文化名人的出生地或文化资源的发源地而打起官司。其实这是十分狭隘的文化观，看似突出了特色，竖起了品牌，实际却因为封闭性和排他性而限制了对外部资源的有效利用，虽然可以一时暴得大名，却无法得到持续的发展，因而也是缺乏远见的。文化的多元属性决定了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

和形成都不可能是单一因素，因此对文化的研究也不应局限于固定的模式或单一的视角。具体到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也不应立足于本位主义，而应以更宽泛、更开放、更长远的眼光加以处置。

这种大文化视野同样适用于鱼凫文化的研究和开发。

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鱼凫文化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4500年前，由于当时小冰河时期的气候灾变引起的全球气温变化，导致过去蚕丛及柏灌部族生活的高海拔地区逐渐不适合人类居住而被迫全部族性地向低海拔地区大迁徙。而迁徙下来的其中一个部族也许就是柏灌部族的主力，他们在下迁到川西平原的时候与当地的原生居民（有可能是更早从云南上来居住的濮人）发生了冲突或战争，由于山下原生居民的文化发展要先进于从山上下来的柏灌部族，柏灌战败，不得不带着他的子民隐姓埋名、四处逃逸，而在这个过程中，柏灌部族在龙门山脚下沿山一带寻找适合部族生存的地方，其间逐步发生了与原生居民或下山稳定下来的其他部族（如蜀山氏、夏后氏）的通婚、融合。最后，他们抛弃了柏灌王的名字而在现在温江寿安这个地区定居下来，最后一代柏灌王就去世在这个地方。柏灌王的子孙，在发奋图强之后，把自己的部族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部族。他们逐步与成都平原上的各蜀山氏部落建立了联系，并与土著居民之一的鱼部落联盟，建立了鱼凫联合酋长国，开始了鱼凫时代的文明。这由温江集中了鱼凫古城址、鱼凫王墓、鱼凫王妃墓与柏灌王墓遗迹可以得到物证和旁证<sup>①</sup>。

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关于鱼凫，更多线索在三峡考古中。此说主要观点是，距今五六千年前，在远古峡江的大溪文化圈里，活跃着一支崇拜鱼的族群。鱼人兴起于湖北随县，后来融入巴人，统称为鱼复人，巫山大溪人正是鱼复巴人。证据是，远古巴人源于壮侗语系的民族，如今壮侗语族中，“鱼”读音为“ba”，远古巴人也极有可能使用同样的发音。说鱼复是鱼、巴两族结合的标志，理由有几点：（1）“复”字在先秦时代读“ba”，与巴人之“巴”是同一读音；（2）在巴人的语言系统中，“鱼”也读“ba”；（3）复（ba）在巴人语言中有图腾物、族称的意思。说鱼纹是巴人和鱼人的图腾都不矛盾。而古蜀国第三朝的鱼凫王朝，正是鱼复巴人迁入川西平原的一支。而“鱼复”变为“鱼凫”，除了“复”与“凫”同音外，还有可能与峡江流域渔人钟爱的水鸟——“鱼老鸱”（鸬鹚，又称鱼鹰）有关。

峡江的鱼复巴人，因为不可知的原因，乘着独木舟，带着深入骨髓的鱼崇拜，一路高歌着逆江而上，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途中，不断有人下船上岸，建立了一个个小小的居住点，直到最后到达了成都平原。在肥沃的平原上，他们不需再为无法采摘足够的野果而发愁，不必在风浪里为生计而拼尽最后的力气，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定居。沿江的定居点，也成为鱼复巴人在成都平原和峡江老家之间的补给站，虽然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峡江，但两地文明确实就此展开交融。鱼复巴人逐渐融入了川西平原的生活之中<sup>②</sup>。

比较两种说法可以发现，鱼凫王朝是柏灌王朝的后人与迁居成都平原的鱼复巴人及古蜀

① 董晶：《柏灌的消亡和鱼凫的由来——柏灌王墓及鱼凫王墓探秘》，《SSWA 快讯》，第 144 号，2007 年 10 月 19 日。

② 《鱼凫，解读三星堆的密码》，《都市热报》，见 [www.cq.xinhuanet.com](http://www.cq.xinhuanet.com)。

原生居民融合后的新王朝。这也说明巴文化与蜀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不以大文化视野予以分析，而片面地认为鱼凫文化源于温江，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鱼凫文化的发展来看，鱼凫王朝辖地广阔，其文化流脉源远流长。

鱼凫王是在柏灌王之后的第三代蜀王，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时代，其活动范围在成都分布广泛。近年来，在成都平原的新津县龙马乡宝墩村、温江县万春镇鱼凫村、都江堰市大观乡芒城村、郫县三道堰古城村、崇州市元通镇双河村及隆兴镇紫竹村，先后发现六座古城遗址，并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被命名为“宝墩文化”。有学者认为，这些密布于成都平原的古城遗址大多属于鱼凫时代。还有专家认为，三星堆文化遗址的二期也属于鱼凫时期。这些遗址距今约 3600—4000 年，相当于夏代至商代前期，已经进入早期蜀文化时期。当时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善于捕鱼的水鸟“鱼凫”随处可见。从岷山等地进入成都平原的蜀人与当地土著人结合，一边在平原耕种，一边学会驯养鱼凫捕鱼。这些蜀人后来被称为“鱼凫氏”，其子孙也以鱼凫为图腾。大约在商代早期，阶级矛盾加剧，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强大富裕的鱼凫部落，利用月亮湾古城堡，扩建三星堆城市，建立古蜀王朝，成都平原进入奴隶社会<sup>①</sup>。

鱼凫文化不仅与三星堆文化联系密切，与金沙文化同样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根据考古发现，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礼器在三星堆都能找到与其相似的原型。在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有个人物刻像，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有人认为，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而在金沙遗址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一条金冠带，在它表面刻的鸟、鱼、箭和人头组合图案与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基本相同，风格也基本一致，只是在排列、组合及细部的刻画上有差异。目前，人头、箭、鸟、鱼的组合图案还仅见于金冠带和金杖上，这些通常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考古学家们据此认为，虽然政权的统治者发生了更替，但金沙文化时期的古蜀人仍然沿袭着三星堆旧时的信仰，也仍然使用着三星堆时期那套政治制度与社会管理模式。

这说明，从鱼凫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金沙文化，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三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不从大文化视野出发，把鱼凫文化当成古蜀文化的一部分，而仅仅视之为一个孤立的文化现象，是无法挖掘其深刻底蕴和丰富内涵的。

再次，鱼凫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在周代以前，蜀与外界的交往只限于秦、巴之间，即使有侯国之名，也不能与春秋诸侯会盟，在各种制度上也与中原大相径庭。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繁荣的文明社会，由于其“书轨与中原异”，所以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这样描述先秦时期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到了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

但包括鱼凫古城址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址群的发现，使人们对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至夏

<sup>①</sup> 吴琪：《破译神秘古蜀文明：三星堆考古发现 20 年记》，《三联生活周刊》，第 30 期，2006 年 8 月。

商之际的文化发展线索有了新的认识。文明的起源大体经历了农耕聚落形态——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三大发展阶段。农耕聚居形态大致相当于四川盆地内星罗棋布的诸新石器时代遗址阶段，是向文明起源发展的准备阶段。而中心聚落形态正与宝墩文化相当。城是中心聚落的重要标志，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型房屋建筑的出现则标志着蜀人酋邦的形成，也标志着长江上游古文明中心的出现，这是古蜀文明的起源阶段。宝墩文化的下限与三星堆文明一、二期相衔接，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已出现都邑国家形态的三星堆三、四期文化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早期古蜀文明达到鼎盛<sup>①</sup>。这说明，在多元一体的中华古文明中，古蜀文明是其中有独立始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的一脉，她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同样历史悠久，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另外，鱼凫古城遗址所在地温江位于北纬30度，北纬30度线是一个神秘的地带，世界上许多著名的自然之谜和人类文明之谜都贯穿在这个纬度线上。比如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如果看不到这种共性，而仅仅将鱼凫文化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就无法认识到鱼凫文化的世界价值，也就无法将其影响进一步扩大。

综上所述，只有以大文化视野对鱼凫文化进行研究，才能不断深化和拓展其研究领域，也才能为其开发和利用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鱼凫文化的开发利用问题：

## 一、挖掘鱼凫文化蕴含的当代精神价值

文化是以人为根本的，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着眼于对人们的精神需要的满足。鱼凫文化孕育于四川盆地，发展于成都平原，因此鱼凫文化发展成形的过程可视为古巴蜀文化的一个缩影。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鱼凫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带来强烈影响：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和对内充分凝聚的向心力<sup>②</sup>。在巴蜀地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桑蚕漆蜡等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精神的形成。先民们以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

<sup>①</sup> 参见谭继和：《巴蜀文脉》，巴蜀书社，2006年，第61—64页。

<sup>②</sup> 同上，第6页。



流，形成巴蜀文化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这种精神，也正是当代巴蜀人敢于开拓创新、能够兼容并蓄的精神之源，是应该不断挖掘并发扬光大的。

## 二、在城市建设中融入鱼凫文化元素

从城市建设方面来看，温江应该抓住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示范区的契机，把鱼凫文化元素融合到城市建设中，实现鱼凫古城遗址修复重现、鱼凫精神传承与发展。比如突出水文化、推出渔猎生活体验馆、加大林盘保护力度，使园中有城，城中有园，做到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和谐交融，城市文明与田园生活有机结合。

## 三、加强区域合作，打造鱼凫王文化旅游品牌

从大文化视野来看，鱼凫文化属于古蜀王文化的一支。目前，鱼凫古城遗址保护规划正在进行中，但尚未实施开发。由于古蜀王文化旅游资源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管辖，且各区域都有旅游发展重心，在开发过程中往往形成政策性障碍，缺乏协调、导致恶性竞争或者重复建设，所以温江应主动加强与三星堆博物馆、金沙博物馆、望丛祠等文化管理部门的联系，争取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古蜀王文化旅游业发展协调机构。鼓励区域内旅游开发投资商、旅游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等与当地相关部门进行合作，共同开发区域古蜀王文化旅游资源，最大限度地挖掘各个单元的旅游发展潜力，扬长避短，使其成为四川的精品旅游产品。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